

A
ABELHA
DA
CHINA

《蜜蜂华报》研究

《蜜蜂华报》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亮点。它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报刊，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创办的第一份外报，同时也是澳门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报纸。本书是迄今为止专门就《蜜蜂华报》这份报纸进行全面深入的个案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作者突破语言关，解密了《蜜蜂华报》的创刊背景、内容特征、传播手段和历史作用。对中国近代新闻史的研究有着重大的补白意义。同样，对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近代史和中外文化传播交流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程曼丽 著
Cheng Manli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

3

《蜜蜂华报》研究

程曼丽 著

Cheng Manli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蜜蜂华报》研究/程曼丽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

ISBN 978-7-302-39854-7

I. ①蜜… II. ①程… III. ①报刊—新闻事业史—澳门—近代 IV. ①G219.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0777 号

责任编辑:纪海虹

封面设计:郭宏观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沈 露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三河市巾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0mm×230mm 印 张:17 字 数:203 千字

版 次: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产品编号:063364-01

总序

〔新加坡〕
卓南生² 程曼丽¹

经过一番甄选与琢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即将陆续出版。它既是学会复会六年来所开展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的集萃,也是吾辈向创会前辈敬献的一份厚礼。

历史上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于1918年10月14日,由时任校长蔡元培亲自发起并担任会长,他同时聘请留美研习新闻学归国的徐宝璜、《京报》社长邵飘萍担任研究会的导师,这三人也因此被称为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三驾马车。

蔡元培校长亲自起草研究会章程,确立研究会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学会拟定的章程、宗旨,学会开设的课程,出版的刊物、教材,成为中国新闻学科建设最初的范本,也使北京大学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摇篮。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很多是当时的进步学生,其中的一些后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也有一些成为著名的新闻人。据史料记载,在获得证书的55人中,就有毛泽东、

1 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执行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

2 卓南生,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兼副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罗章龙等人的名字。这段往事已经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2008年4月15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恢复成立，按照惯例，许智宏校长任会长，并聘请首批10位海内外学者担任研究会导师。《光明日报》用整版篇幅介绍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历史及恢复成立的情况；人民网对导师聘任仪式进行了全程直播报道。

恢复成立后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一方面继承和发扬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力求开拓进取，创造新的业绩。

复会以来，研究会连续举办了五届年会，主题分别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暨五四时期新闻传播专题史研究”“东亚新闻学与新闻事业的回顾与反思”“新闻史论教育与研究面临的难题与困惑”“如何研究新闻史如何弘扬学术精神——以《新闻春秋》公开发行为契机”和“新闻传播学的本土化与主体性的再思考”。

复会以来，研究会传承历史，连续举办了五届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截至2013年，毕业学员达到100名。学员来自国内三个新闻机构、一所海外大学和64所国内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河南大学、河北大学、湖南大学、厦门大学、广西大学、西北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等。2011年，特训班学员自行成立了同窗会，2012年和2014年又相继成立了两湖分会和东北分会。

复会以来，研究会与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40多次北大新闻学茶座。光临茶座的有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学者和业界人士。茶座讲座的部分内容刊登在《国际新闻界》《世界知识》《参考消息》《新闻春秋》、新加坡《联合早报》等报刊和财团法人卓越新闻基金奖的

网站上。近年来，北大新闻学茶座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中青年学者、学子，形成了一个跨国、跨界、跨校、跨学科的学术共同体。

复会以来，研究会出版《北大新闻学通讯》14期，并且开设了专门的网站（<http://ioj.pku.edu.cn>）和专门的公共邮箱（iojpk@126.com）。

在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基础上，2013年7月，学会成员首次走出国门，与韩国言论学会联合举办有关两国媒介产业发展的研讨会，搭建起了中韩两国学者可持续交流的平台。

2013年11月9日，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支持下，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和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举办了“十年再出发——中国新闻发布实践与创新论坛”，各部委十数位新闻发言人与会并围绕如何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人民网、中国网全程直播，《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作了大篇幅的报道。论坛文集《十年——新闻发言人面对面》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复会以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开展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在海内外新闻传播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十周年之际，新闻学著名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总顾问方汉奇先生对于北大的新闻学教学、研究作出这样的评价：“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十周年了。她在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方面拥有四个全国第一，加上站在她背后的北大的声望和影响，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已经后来居上，跻身于中国新闻教育的第一团队。希望她脱颖而出，为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发展继续努力，不断作出新的贡献。”（参见方汉奇教授2011年5月29日的微博）2013年12月21日，在纪念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95周年、复会五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方汉奇教授作为学会成长的见证者，在发言中强调：“从复会到现在，会员们对新闻理论与实践中的众多问题进行了

研究和探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复会后五年的工作已经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我们期待她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即是研究会复会六年来所开展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的全面展示。它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经典新闻学著作的再版，研究会导师的研究成果，特训班学员的优秀成果以及研究会学术活动集萃。我们的初衷和心愿是：通过“文库”的出版，贯通“古今”，延续血脉，传承薪火，砥砺前行，让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优良传统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对吾辈而言，这亦是一份历史责任。

2014年10月14日

复会六周年纪念

176年前，在中国新闻事业史的漫长画卷上，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亮点，它像彗星那样倏然而来，飘然而去，停留得非常短暂，却闪烁出耀眼的清辉。这就是在澳门出版的葡文《蜜蜂华报》。

《蜜蜂华报》创刊于1822年9月12日，终刊于1823年12月26日，寿命很短，只出版了67期，一年零三个月，但在长达1300年以上的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拥有三个第一：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报纸，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家报纸，澳门有史以来的第一家报纸。任何论述和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史的书和人，都不能无视它的存在，都要在它的身上投下重重的一瞥。

我第一次知道《蜜蜂华报》的名字，是在52年前初读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这本书的时候。在这本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的开山之作的书中，我读到了作者关于它的简短的介绍。简短到只有寥寥数行，除了年份和外文报名之外，全部内容还不到三十多个汉字。直到五年以前，我所知道的有关《蜜蜂华报》的情况，仅仅限于这些。

1994年，香港的一位朋友来看我，送给了我一本新近由澳门大学和澳门基金会照相翻印的《蜜蜂华报》精装合订本（28.2cm×21.5cm×3.2cm），除了失藏的一期之外，澳门和葡萄牙本土公私图书馆中收存的全部《蜜蜂华报》尽在其中。我披卷摩挲，大喜过望。因为终

于可以一亲芳泽，瞻仰它的风采了。它就在我的面前，不再十分遥远了。研究它已经成为可能了。但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遗憾：不懂葡文，难窥堂奥。

这以后，陆续看到了一些港澳学者所写的涉及这份报纸的文章，对它的情况，稍稍多了一点了解，而且知道已出版的中国新闻史专著对它的记述，多有差错，仅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那三十多个字的介绍中，就有四处错误。这些，都使我感觉到，非常需要有人投入力量，对这份报纸进行一番仔细的研究。“原报”俱在，和以前比较起来，条件也已成熟。

因此，当本书作者以在职副教授的名义攻读新闻史方向的博士学位和选择学位论文题目的时候，我就向她推荐了这个题目。同时提供给她，供她选择的还有别的一些题目。但她最后还是选定了这个题目：《〈蜜蜂华报〉研究》。

我很赞赏本书作者的勇气，但也为她能否顺利完成任务感到过担心。因为写这个题目，有一定难度。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外文，二是资料。但在她的努力下，两个难点都顺利地解决了。

首先是外文。《蜜蜂华报》是用葡萄牙文编印的，不通葡文，就无从下手。本书作者的外语基础很好，俄语、英语都十分娴熟，但从来没有碰过葡语。为了完成这一选题的研究，她下决心突击学葡语，结果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整部《蜜蜂华报》就能够看下来了。这一情况，有点像当年的苏步青教授。后者在东京大学念学位的时候，为了学好解析几何，仅用了半年时间就攻下了德语，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攻下了意大利语。隔代学人在学习外语这个环节上的刻苦攻坚精神，是相同的，也是同样令人赞叹的。

其次是资料。除了这部报纸的照相翻印本外，有关《蜜蜂华报》的情况，中葡历史文献中都很少记载。连《蜜蜂华报》出版前后在澳门定居的外国传教士所写的有关澳门的专著中，竟然也没有提及。这给研究

者带来不少困难。通过阅读和征引大量有关葡澳历史的外国材料，和其他二手材料，这一难题也终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解。

从已完成的论文看，本书作者对《蜜蜂华报》创办的历史背景，创办的客观原因，它的内容，它的信息传播渠道传播手段，它的特色以及它的影响的论述和分析，是十分深入的。她已经接近完美地完成了对这份报纸的全面研究，给渴望了解这份报纸，对这份报纸各方面情况存有种种疑问的读者，特别是其中的中国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答案。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专著，就是本书的作者在上述论文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它是迄今为止专门就《蜜蜂华报》这份报纸进行全面深入的个案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对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中外文化传播交流史的研究，这部专著都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鉴于澳门一年后即将回归，有关澳门政治经济文化和新闻出版事业的历史，受到更多的人的关注，这部专著的出版，具有特殊的意义。应该说，它的问世，也是对澳门回归祖国的一个很好的纪念。

外国人在中国从事办报活动，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一个特殊的篇章，继《蜜蜂华报》之后在中国境内出版的外国人办的中外文报刊，不下数百种，出版时间长的，甚至超过一个世纪，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群体。然而，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报纸的个案研究，是很不够的。本书的作者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好头，我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和投入这方面的研究。这对整个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1998年夏于北京林园

一

在西方国家，近现代报刊是伴随公民社会政治意识的形成而出现的，旨在以更快捷的途径传播反对传统建制的先进思想意识，《蜜蜂华报》的诞生，自然也不例外。

1820年8月24日，葡萄牙自由主义运动得到军人的同情和响应，推翻帝制，创立君主立宪制度，并于1821年通过新闻自由法案，废除自1768年开始实行的新闻检查制度。当年12月22日，海外殖民地——印度果阿便出现《果阿钞报》（*Gazeta de Goa*）。澳门葡人也不甘落后，于次年9月12日创办了《蜜蜂华报》。事实上，这也是中国领土内第一份现代报刊。

《蜜蜂华报》由立宪党澳门分部首领巴坡沙（Paulino da Silva Barbosa）中校和阿美达（José de Almeida）医生创立，由阿马兰特（António de S. Gonçalo de Amarante）神父编辑，在官印局印刷，每逢周四出版。

顾名思义，蜜蜂会咬人，而被咬的当然是旧有建制和保皇忠君的人了。首当其冲的有判事官亚利鸦架（Miguel de Arriaga B. da Silveira）和前总督欧布基（José O. Castro Cabral e Albuquerque）。

葡人自16世纪中叶据居澳门以来，一直以议事会形式进行内部自治。1640年葡萄牙摆脱西班牙统治后，开始确立中央集权政治，殖民地也不例外。1642年7月14日，设立海外委员会，为国王统治殖民地提供咨询。然而，在其后一百多年中，澳门仍是一个被遗忘的小岛，议事会既不理睬亦不听从里斯本或果阿的指令。

1783年4月4日的“王室制诰”，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唐娜·玛丽亚一世（D. Maria I）赋予总督充分的权力，去扮演澳门政治生活的主导角色。从此，议事会权力逐渐丧失，其作出任何决定前，都要先听取总督的意见，对总督和王室法官负责。自从总督和王室法官介入议事会事务，他们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便不时发生，特别是与精于权术的亚利鸦架王室法官的关系，更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1820年立宪革命的胜利，令澳门葡人顿时欢欣鼓舞，认为推翻独裁政权统治、重建澳门自治的时机来到了。在欢呼胜利的同时，将管治权从总督欧布基手上夺了回来。《蜜蜂华报》创刊号的社论这样写道：

“受议事会之托编辑本报，我们认为，作为编辑的主要责任之一是真实坦诚地表达加速取得上月19日胜利的原因。这是难忘的日子，澳门人聚集在自由亭周围，推翻了忍受多年的专制统治。虽然我们承认，这项任务并非我们的力量所能完成的，但并未因此不能显示我们要齐心协力、结束独裁专政的决心。这次胜利，巩固了市民的权利和义务，并在大众的欢呼声中，依居民的普遍愿望建立了临时政府……”

巴波沙以绝对优势票数当选为总督，执掌包括议事会权力在内的临时政府。《蜜蜂华报》成为自由党的有力武器，以社论、读者来信形式检举报复旧势力。亚利鸦架逃到广州躲了起来，以图东山再起，而欧布

基则被遣回果阿。

可是，自由主义运动好景不长。1823年5月27日，米格尔（D. Miguel）王子宣布起义，葡萄牙恢复帝制。果阿总督也随即派出舰队，到澳门恢复社会秩序。一向与广东官员关系良好的亚利鸦架，要求中国当局向澳门葡人施压，制造紧张气氛，迫使澳门自由党人屈服。在海面等候多时的萨拉曼特拉号（Salamandra）舰上200名官兵登陆后，亚利鸦架自广州回朝，象征性地将8月28日那期《蜜蜂华报》在王室法官署前烧毁。该报苟延残存，至12月26日停刊。创办人巴坡沙被送往果阿受审，主编阿马兰特逃往加尔各答，阿美达医生则潜逃新加坡。至今，新加坡仍有阿美达街（D' Almeida Street）。

三

《蜜蜂华报》一共出版了67期。遗憾的是，它如许多旧报刊一样，没有完整地收藏保存下来。澳门大学和澳门基金会在重印该报时，虽竭尽全力搜罗，仍缺1823年3月20日那期的其中4个版。

《蜜蜂华报》作为中国领土内第一份近代报纸，具有无可置疑的历史意义。该报除了刊登前述的政论和读者来信外，又是当时的政府公报，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对了解研究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极有帮助。概而言之，这些材料包括：

——议事会之通告、会议记录；

——海外部国务秘书向果阿总督发出的指示和报告，以便指引驻北京主教与中国官员处理有关澳门的事宜；

——印度总督给议事会的信件；

——对王室法官亚利鸦架及其生意的调查；

——澳门的政治局势报道；
——议事会与中国地方当局的往来文件以及省城消息；
——议事会与市民的来往信件；
——当时巴黎、伦敦和纽约报纸对葡萄牙政局以及其他事件的报道转载等。

四

记得四年多前在《蜜蜂华报》合订本的发行仪式上，著名澳门史学家潘日明神父（Pe.Videira Pires）还感叹史学界对这份重要的报刊既不重视也乏研究。而他本人在介绍该刊时，亦限于讲述葡萄牙立宪运动及其对澳门政治的影响，并无大量涉及报刊的内容。意想不到的是，今天已有一部全面、系统的《〈蜜蜂华报〉研究》摆在我们面前，而这份研究竟是由一位在《蜜蜂华报》合订复印本出版之后才开始学葡文的华人学者完成的。令人鼓舞和兴奋之际，我们不能不衷心向程曼丽博士表示敬佩和谢意，感谢她为澳门研究作出的贡献，也期望她继续关心澳门、研究澳门，不断有新作问世。

程曼丽博士曾提出将我多年前写的一篇有关《蜜蜂华报》的短文与她的博士论文一并发表，今又再三嘱我为其大作写序，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她的诚意以及我对她为学精神的敬意，都令我无法推却。于是，我将那篇短文略作修改，草就此序，一举两得，请读者指正。

吴志良

1998年8月3日

当我最终决定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外报——《蜜蜂华报》”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时，立刻便有诧异的、疑惑不解的目光向我投来。那目光分明是说：《蜜蜂华报》？一份小得几乎无人提起的报纸，只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况且是用葡萄牙文出版的，读者对象是外国人……花那么大的气力研究它，值得吗？

值得不值得，关键要看研究的必要性有多大。

窃以为，就其历史地位的特殊性而言，就其角色的不可替代性而言，中国近代史上的任何一份报刊——无论是中文的还是外文的——都不能与《蜜蜂华报》相比，因为它同时占据了三个第一：它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报刊，它是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创办的第一份外报，它同时也是即将回归的澳门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报纸。

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报纸。

《蜜蜂华报》为中国近代报业之滥觞，早已成为学界公论。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指出：

我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语其时间，以葡文为较早；数量以日文为较多；势力以英文为较优。……A Abelha da Chine（按：“Chine”应为“China”之误引）（意译《蜜蜂华报》）发刊于一八二二年九月十二日。……

方汉奇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中指出：

……近代报刊在中国的出现是与西方国家的入侵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同时开始的。……最先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近代化报纸，都是外国侵略者首先创办起来的。……其中，《蜜蜂华报》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纸。

《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二版）一书指出：

中国境内最早的近代报刊，是葡萄牙人在澳门创办的。《蜜蜂华报》……是中国土地上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刊。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指出：

在中国，近代化的报刊，是外国人首先创办起来的。……1822年9月12日创办的《蜜蜂华报》（*A Abelha da China*），被认为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纸。

无须多加引证，《蜜蜂华报》——“中国境内近代第一报”的结论已是确凿无误的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百多年来，尽管中国近现代新闻业发展之长河奔涌不息，且日渐壮阔，它的源头（即这个“近代第一”）的面貌却始终未见清朗。在上面提到的中国新闻史学界公认的几本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中，涉及《蜜蜂华报》的文字可说是寥寥无几：多的如《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二版），不过300余字，少的只有十几字到几十字。如此简约的笔墨，充其量只能对这份报纸创办的时间、地点、创办人等基本要素写意般地作一个勾勒，而对它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它的形式、内容、特征；它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及其互动关系等深层次的问题，就不可能进行详细描摹了。但是，《蜜蜂华报》的地位毕竟很重要，缺乏对它的了解，“转型期”（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社会转变；古代报刊向近代报刊转变）中国报业发展的许多问题便无从探知与把握。

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创办的第一份外报。

撇开中国的近代报刊始于外报这一点不谈，外国人在华办报本身就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大特殊景观。

外国人在华办报始于19世纪20年代（《蜜蜂华报》即为嚆矢），至19世纪末期，逐渐形成以英美报刊为主干，以上海、香港为主要基地的在华外报网络，出现了一大批由外国传教士和商人主办的、影响深远的中外文报刊。据记载，鸦片战争后至1894年（甲午战争），外国人在华创办的中文报刊约有70种（海外不计），外文报刊约有80余种。¹它们形成了一种强劲的发展态势，几乎成为当时中国新闻业的主体。

然而，在对这段历史进行考察时，我们的研究者更多注意的是其中的中文报刊（这是可以理解的）、英文报刊、法文报刊以至日文报刊，而对《蜜蜂华报》和在它之后出现的葡文报刊却绝少提及（鸦片战争以后，在澳门、香港、上海等地都有不少葡文报刊出版）；即便提起，也是将其打入“另册”，仿佛它们对中国报业的影响可以从略——“……葡文报刊因基本上在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出版，与鸦片战争前后形势的变化不大，故暂不计入。”²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一种误解，似乎人们只须观赏长河入海的壮美景象就够了，对它的源头大可不必究诘。

事实上，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有机联系着的过程，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澳门是外国人在中国最早实行殖民统治和舆论控制的地方，恰恰在这里，而不是在别的地方诞生了中国的第一份外报。对这份报纸不作任何研究，我们就无从了解在“壁垒森严”的天朝帝国，外报这个“缺口”是如何打开的，它又是怎样在中国这块特殊的

1 方汉奇主编，宁树藩、陈业劭副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28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2 方汉奇主编，宁树藩、陈业劭副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24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